

亲爱的，星期六见

2001 年夏天，我的女儿小罗汉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回国探亲。

小罗汉是 1983 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在大学四年中，她一直被评为全美优秀生。 1987 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荣获耶鲁大学的奖学金。

耶鲁大学在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美国很多知名人士皆为该校毕业生。前总统布什、克林顿都是耶鲁大学的校友。我庆幸小罗汉能就读于这所高等学府。

一年后，小罗汉就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现在在波士顿某大公司工作。

这些年北京的变化之大，令小罗汉眼花缭乱。宽阔的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新的高楼，到处是草坪、鲜花。姑娘们着装和港台的时髦小姐一样新潮,看起来十分靓丽,小伙子们也很‘ 酷 ”,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罗汉一路上目不暇接，口中啧啧赞叹不已。

然而小罗汉最想看的仍然是天安门，她要让她的儿女们对祖国的心脏有一个印象。

我问“：这样小的孩子会记得吗 ?”

她立即回答“：会的,我对三岁时发生的事印象很深,一直牢记心中。”

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并在如织的游人中穿梭来回，和大家分享观光的欢乐。然后，我带他们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小罗汉父亲——姚桐斌烈士的‘两弹一星’闪闪发光的金奖前,她抱起了三岁的女儿,我牵着外孙,我们一起合影。

此时,我突然想到,当小罗汉三岁时,她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虽然未能抱她，但是他一定在呼唤着我和他心爱的女儿……我们全家都永远记住那天发生的事。

1968 年 6 月 8 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我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被允许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

我任教的外语院校坐落在北京西郊，我的家在桐斌工作单位附近，却在南郊。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虽然我好像罐头里的一条沙丁鱼，前后左右紧贴着人群，但我已习以为常，并不在意，只盼着车能开快一点，使我能早一点看到亲人。

北京的天气，虽然是初夏，已开始变热了。我走了一段路以后，有些出汗。天气闷得很，看样子要下雨。由于走得快，我几乎有点窒息。但是想到就要回到温暖的家，见到阔别一周的丈夫和

孩子们，我想像着孩子们见到我时围过来的欢乐情景，叽叽喳喳地抢着讲话。每当桐斌回家，他们又围着爸爸喳喳叽叽。一想到马上就要享受的天伦之乐，疲劳顿时消失，我更是归心似箭，快步如飞，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 35 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 5 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了，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也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个女人在瞎说，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我极力支撑着自己，听保姆哆哆嗦嗦地讲述惨案发生的经过。

几天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桐斌看到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时，曾和几位干部商量，怎样才能使生产不致停顿下来，但干部们的话

已不起作用了。

桐斌不愿随波逐流，每天到办公室去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

“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

因此,6月 8 日，当两派发生武斗时，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我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桐斌记挂孩子，还是回家了。

回家后，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扒上一口饭，几个混入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踢开门冲进我家，他们架起桐斌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又有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冲上来，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并且把桐斌的眼镜揪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踩碎,还恶狠狠地骂道：

“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桐斌的脸被打肿，鲜血从嘴角流出来。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们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 !装什么蒜 !你又没死 !”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 !”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

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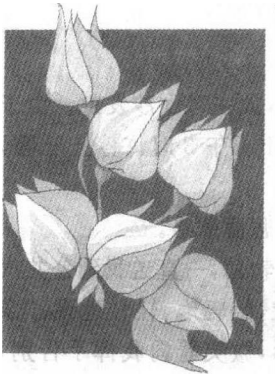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 3 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保姆哭哭啼啼地将经过讲完，我听后悲愤欲绝。

桐斌，几天前我上班时你是那样生气勃勃，一直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我像往常一样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轻轻地、轻轻地说：“亲爱的，星期六见！”你自然读得懂我的口形，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次的分手竟成了我俩的永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是这样的人

桐斌 1922 年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童年靠父兄做小本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由于家境困难，父亲不想让桐斌继续读书，要他像哥哥一样，在家中做帮手。可是校长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数次来到姚家劝说：“像这样好的学生,不上中学实在太可惜了。”大哥也极力支持弟弟上学的要求,桐斌的态度更是坚决:“我要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同意让桐斌上无锡县中学。这是 1933 年，桐斌是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

上中学后，家里的开销更大了,12 岁的桐斌不得不辍学。父亲给了他一点资金,让他在镇上摆个小摊,卖点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打零工维持生计，同时积攒读书需要的费用。到了晚上，桐斌就一头钻进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课本，艰苦自学。两年后，他带着一点点积蓄只身来到上海成康中学读高中。半年后转入江

南中学，由于缴不起住宿费，他只好每晚睡在教室里。

此时，上海和无锡都先后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烧杀抢掠，同时实行奴化教育，规定学校的教学内容，企图培养一代日本国的“良民”。桐斌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更不愿读侵略者规定的课本和日本语，便瞒着父亲，和四位同学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流亡途中他得了伤寒，幸被一家好心的农民收容，让他服中药、养病。历经艰险，1939 年桐斌终于到达江西省吉安县，考进了国立十三中的高中部。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他大骂暗中资助桐斌的大儿子，还写信给桐斌，扬言只要他回家就打断他这个不听话儿子的腿。

桐斌读书十分用功，毕业时，在江西全省会考中，取得个人总分第一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为十三中争了光。为此，校长发给他一笔奖金，以资表彰。桐斌用这笔奖金到湖南考区参加了几所大学的招生考试，为了省钱，他一路上在学校、祠堂里借宿。

桐斌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当时迁往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

桐斌上大学时勤工俭学，为校方做些打扫实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还为一位高中毕业生补习物理，以补助生活费用。

当时交大授课，不管有无课本，一律用英语，桐斌总要作笔记，字写得秀丽清晰，一丝不苟。他的勤奋尤其得到了矿冶系主任王钧豪教授的赞赏。授课时，王教授不时停下来问：“Mr. Yao，你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桐斌的刻苦全校有名。在校图书馆后面有一片幽静的小丛林，桐斌经常在那里看书。有一些恋人也选择在那儿幽会，他们跋涉爱河并不回避桐斌，他们知道，他的心完全沉浸在书本里，不会留意别人的事。

那时，我还不认识桐斌，我只是和他相识相爱以后才知道，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他总会努力攀登在前面。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那时他之所以专心求学,心无旁骛,是因为他在等着我……

1945 年毕业典礼那天，校长走进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人们听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姚桐斌，他以全校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此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桐斌被分配到迁至四川北碚的中央研究院矿冶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但是桐斌并没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他给自己定下了又一目标：争取出国留学。

1946 年，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此次考试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竞争十分激烈。但是桐斌以无可争议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他看中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

出国前，桐斌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期间，父亲的经商颇为顺利，家境宽裕多了，盖了一座有两层楼的屋子。父亲见儿子学有所成，自然是喜笑颜开，以前父子间的不理解消散殆尽。

当时，这些考取留学的学生，都必须在南京集中几个月，学习一些国外的礼仪、风俗、人情等。那时，我在南京读高三。我问桐斌“: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会与我相爱吗?”他回答“:不会。中学生太年轻,不应该交男朋友。”

英国历史悠久的伯明翰大学于 1947 年秋迎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国青年。桐斌选择了在工业冶金系攻读博士。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桐斌被这里荟萃的众多名师吸引了，他师从终身教授康德西博士(V. Kondic) 。来到异国他乡，桐斌除了一如既往地苦读外，同时注意到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重要性的体会。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1949 年桐斌已没有公费，只好把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桐斌仍然于 1951 年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

1952 年 1 月，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1953 年即从该学院毕业，并在该学院任教和做研究工作。此时，发生了一件科学家们意料不到的事……

在英国留学时，桐斌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了，桐斌和海外留学生激动万分；他们感到中国真正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在上海租界一公园门口挂着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这种侮辱性的牌子再也不会出现了。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向国内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得到回电。

作为学生会主席，桐斌经常收到新中国的报纸、杂志和一些影片资料。看到祖国的进步，桐斌等人十分兴奋，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情况，这引起了敌视新中国的英国政府的注意。

一天，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 的通知，约他去“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英国。同事们忿忿不平，对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极为不满，可是又无能为力。

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 Pivowarski) 听到此事，邀请桐斌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让他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去亚亨前，桐斌在慕尼黑大学进修,提高他德语听、说的能力。

1954 年初桐斌即赴亚亨工业大学报到。他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和工作作风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桐斌对德国同事也很有好感,他空闲时和他们一起去喝啤酒、聊天,感情十分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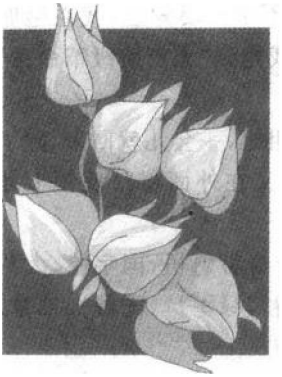
他的德国同事生活优越，个个人高马大，有的还有啤酒肚，而桐斌却依然高瘦挺拔，如玉树临风，真是奇哉怪也！

在亚亨工业大学期间，桐斌写过多篇关于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的论文，并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他的工作获得了好评，被好几个国家的大学聘请讲学。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祖国，他要让人们在了解他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了解新中国。在此过程中，桐斌自己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受到了党的教育，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 年底回国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希望桐斌能去他们那儿工作。但后来，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

研究所建成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〇三所,桐斌被任命为所长。对实验室的设计，仪器装备的购置，科研规章的建立，科技人员的培训等，他都事必躬亲，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都忙得回不了家啊！

就是这样一位淡泊名利、废寝忘食、专心致志地搞科学研究的人，却无法躲避政治的漩涡。最后，竟惨遭毒打致死！



天使的愤怒

那天，外面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仿佛是天使对人间的残暴表示愤怒。

雨停后，保姆几次向我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吞吞吐吐地对我说：

“我想到别人家借住一晚,好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时请她捎一张便条，把桐斌被害的噩耗带出去。因为家里的电话，在当天上午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割断。保姆被吓坏了，她不敢带便条。我别无他法，只好叫我大女儿去一位朋友家，请他领我女儿去找军代表[①],向他们报告她父亲被害之事。

当时，整个第七机械工业部已被军队接管，每个研究所都进驻了解放军。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让这些杀人凶犯逍遥法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女儿还没回家，恐惧又袭上我心头，是不是她被人抓走了？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幸？要知道，我在她兜里塞进了一张给军代表的纸条啊！于是我跑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想把事情弄个明白。

我向两个小女儿交待：‘妈妈出去找姐姐,一会儿就回来,除了妈妈外，谁来了也别开门。’我仍不放心，又在外面将门反锁上才下楼。

我走近‘总部’时,只见门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国字脸,大约三十来岁的人，他头戴柳条帽，身穿白衬衫，绿军裤，配戴红袖章。我责问他：

“你们为什么要打死我爱人姚桐斌？”

“我们没打死他,送他回家时,不是好好的吗？”那人一副无赖嘴脸地回答。

“送到家？你们把他拖到楼前人行道上，不顾他的死活就走了，连家属要求送医院抢救也不准许。”我越说越气，声音也激愤起来。

“你们有什么权利抓我爱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打人？我的女儿出去没回家，是不是也被你们的人抓走了？”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找不到你女儿,关我们什么事？”他说完,一转身,走进楼去。

回到家中，只见我那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客厅门口，她们父亲的遗体就在她们身后，我们母女又相抱而泣。

这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我怀中抽抽泣泣地就睡着了，可是我却难以入眠。桐斌的遗体就在隔壁客厅里,虽然近在咫尺,却已是天上人间,阴阳相隔了。

就在桐斌被害的前几天，我和他避开孩子，在卧室里有过一次忧心忡忡的谈话：

“现在局势很乱，听说北京有的大学有教授被打死了，你看是否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

桐斌不同意，“外地更是乱得厉害。据说，有些地方都动枪动炮了。”

我点了点头，他接着安慰我：

“别担心,我俩都没有历史问题,有什么可怕的 再说,我们身居首都，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难道还会有人敢胡作非为？”

是呀！他说得有道理，我们怀着赤诚爱国之心，回到祖国，不会有人加害的。这样一想，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我们错了！

我们太老实了！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力和残酷估计不足,以至于弄得家破人亡。为此，我怎能不饮恨终生？

蓦然间，《白毛女》的歌声通过高音喇叭传到我的耳中。

“文革”时,到处都安上高音喇叭,这样,造反派任何时候都可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时，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革命样板戏[2]。

据说,《白毛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佃户杨白劳因交不起地租，地主黄世仁派狗腿子把他的女儿——喜儿，抢走抵债。杨白劳极度悲愤，喝卤水自杀。后来喜儿不堪凌辱，逃到深山，她怀着深仇大恨，顽强地活了下去。但由于山中缺吃少穿，连盐也没有,喜儿很快就披着一头白发,故称之为‘白毛女’。

喜儿的未婚夫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随队伍回到村里，把喜儿从深山里救出来，喜气洋洋地结了婚。人民政府法办了地主黄世仁。

《白毛女》有电影,也有歌剧,我看过以后,深受感动,也喜爱它的主题歌《北风吹》,只要听到这个乐曲,我心中就激动不已。

《白毛女》的故事是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旧社会把一个青春少女变成‘鬼”,新社会却把‘鬼’变成了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此时此刻,当我再一次听到《北风吹》的旋律时,却是百感交集，心里充满着悲伤和惶惑。今天，一个全心全意为祖国工作的科学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活活打死,他的遗体,停放在家中已十多个小时却无人过问！

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 月 9 日来临了。

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带着我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这时，那位高个军代表对我说：

“昨天因为时间太晚了，不放心让您的女儿回来，故而让她住在我们那里。”

“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

“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大将乘直升飞机来这里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于是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姚桐斌同志被打死的经过。这样一来,时间就拖晚了。”

“一个九岁的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不算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没有政治问题，历史清白，是一个好同志吗？”

军代表也承认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这两位军代表用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来安慰我，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话都不能减轻我的凄苦和哀伤。

我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孩子们失去了慈祥可亲的父亲，这损失

难道能弥补吗？

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大有作为的科学家。桐斌才四十五岁，正是出成果的好时光啊！这损失还算小吗？

军代表见我没吭声，只好告辞：

“我们得走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这么热的天气，就这样把我爱人放在浴缸里？”

“我们已经和几个医院联系了，都说没地方停放遗体。”

“死的人太多了吧？连太平间都有人满之患？”

他们尴尬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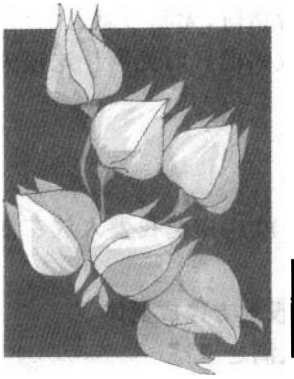
“您好好休息一下，这几天，我们会派战士早晚各送一次冰块来的。”

说完，两位军代表就急奔下楼而去，留下我和三个孩子孤零零地守着她们父亲的遗体。

注 释

①军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被军管的单位，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人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掌权，而人们称呼这些解放军为“军代表”。

②革命样板戏：当时江青在全国树立作为样板的几个现代题材戏剧，被称为“样板戏”。其中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和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 299 页，求实出版社，1989 年）



我不能没有你

军代表走了以后，我和女儿们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不知如何来互相安慰，只有我们三岁的小女儿，用她的小手轻轻拭掉我脸上的泪珠。

我抬头环顾屋里，整个客厅空荡荡的，沉寂得可怕。“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1]，窗外花池里的几株美人蕉，室内的橡树和吊兰，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砸毁了，就连柜橱里的一些小摆设，如花瓶、石膏像和墙上挂的风景画等也被一扫而光。

如今，墙上只挂着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毛主席从墙上盯视着我们，不知他是否看见了被人打死的桐斌？不知他是否看见了以泪洗面的孤儿寡母？

“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在这间客厅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进门，透过雪白的窗帘，能见到窗外花池里那一排嫣红的美人蕉。

室内的吊兰和橡树使客厅生气盎然，一面墙的格子里摆满了我们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副城堡似的亚亨工业大学校园风光画。

孩子们欢声笑语，唱唱跳跳，好不热闹。只要桐斌不加夜班，我们全家就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爸爸”“爸爸”之声不绝于耳。全家兴高采烈，孩子们都争着跟父亲说话，要父亲给他们讲故事。谁能紧挨父亲，得到父亲抚爱，就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小女儿特娇，总是抢先爬到爸爸的腿上。

每次桐斌一进家门，小女儿就一颠一颠地拿着父亲的拖鞋，放在地上。

“爸爸 鞋鞋。”

“哎呀 真乖！”桐斌心中乐开了花，将她抱在怀里，不住地亲她。“爸爸，我也要。”“我也要。”两个姐姐提出要求，桐斌轻轻地拍拍她们的头，然后用两手将她俩围住。该睡觉了，孩子们还赖在客厅不走，总要保姆催几次，抱起小三，两个姐姐才恋恋不舍地去睡。

桐斌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虽然是学工程的，但中文根基极好，不但文章写得漂亮，还能做诗填词。在写信给我时，兴之所至，也曾来过几首诗。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在家乡上小学时，就得过奖，图画老师曾鼓励他长大了当一名画家。

有一次桐斌出差到外地，寄回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一张素描飘然落下，上面画着一只母鸡带领三只小鸡，正向着一只昂首阔步的大红冠公鸡挥翅告别。这时，三个孩子围过来看画，急切地找出自己：“这是我！”“这个是我！”“这是妈妈！”“看，爸爸还戴着眼镜哪！”小小一张素描，留下了孩子们的欢笑……

桐斌特别爱好古典音乐，我却喜欢 Rogers and Hammerstein 的轻快乐曲。在他的影响下，我也逐渐喜欢贝多芬、巴赫和莫扎特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成了我俩的至爱。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